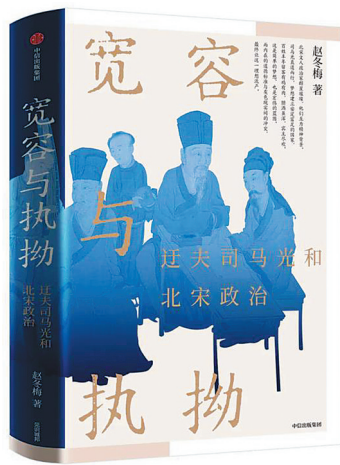


历史学者像
一个采矿人

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晶 通讯员 余雪莹 谢宇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赵冬梅的新书《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以下简称《宽容与执拗》)入选2024年4月中华读书报月度好书榜。5月底，赵冬梅受邀来到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主讲《东坡过岭——命运与选择》。不论是新书，还是讲座，赵冬梅讲述时，都为主角们铺垫上丰厚的时代背景，人物所处的历史舞台上细节真实生动。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专访了赵冬梅教授，听她讲述小尺度历史书写中的大尺度观照。

并不只是为司马光立传

《宽容与执拗》并不是赵冬梅第一次书写司马光。

10年前，赵冬梅在《司马光和他的时代》一书中写到司马光45岁，4年前的《大宋之变：1063—1086》一书对司马光的后半生有浓墨重彩的讲述。《宽容与执拗》对司马光的书写涵盖了从其出生到去世的整个生命历程，主要叙写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的成长、成熟及其最后的“失败”。本书不应仅仅视为司马光的传记，而是以司马光串起一部北宋政治文化史。

司马光生于1019年，卒于1086年，历经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5个皇帝。回望千载，司马光面孔是多样的。他是宋人眼中恤民爱民的司马丞相，也是当代人熟悉的顽固守旧派、王安石变法的死对头；是古代孝子的典范、温和敦厚的友人，也是坚韧勇毅的台谏官、保守稳健的改革者；是私德高尚的政治家、名垂青史的文正公，也是充满局限的木偶、宽容政治的掘墓人。古往今来对司马光的解读，赵冬梅认为多少带有一些偏见。

从历史角度看，司马光绝非上佳的宰相人选。司马光的成长过程过于单纯顺利，作为一个高级官员的小儿子，他从小受到父亲的庇佑，后来又有恩师庞籍的提携照顾。如果跟王安石相比，司马

光独当一面的地方工作经验，以及实际行政工作历练都太过缺乏。司马光从父亲和恩师那里得到的，基本上是正面的官场教育。这让他对“诚实”“孝道”“守职”等道德信条终生保持了坚定信心，也让他现实政治的“灰色地带”面前应对失措、狼狈不堪。

从《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到《大宋之变：1063—1086》，再到《宽容与执拗》，赵冬梅对晚年司马光政治形象的看法在不断改变。起初，赵冬梅认为：“司马光得到了宰相的高位，却背弃了自己一生的信仰，变得像他的对手一样专横，不再宽容，不再谋求异见的共存相挽。”后来，她逐渐坚定了自己的新认识：“司马光没有晚年变节，背弃宽容，他一以贯之，始终追求心中真理，希望重建宽容政治。但就是这样这样的司马光，在哲宗初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无可奈何又合情合理地‘必然’走向宽容的反面。”

司马光关心老百姓，追求国家的整体利益，力求在朝廷和老百姓之间建立和谐的统治秩序，因此得到了民众的敬仰。但是，他的内在道德标准和现实之间的冲突，让他的理想没能实现并造成严重后果。这是司马光的遗憾，也是时代的遗憾。

司马光是所处时代的中位数

按照生卒年月、跨入政坛岁月、政坛上活跃的时间，赵冬梅将整个北宋政治代际分成了五代：零代，代表人物赵普；一代，代表人物寇准；二代，代表人物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三代，代表人物司马光、王安石；四代，代表人物章惇、苏轼、苏辙、蔡京。

在赵冬梅看来，相对于更为“光彩夺目”的王安石，司马光在政治史研究当中是个不太被重视的人。他一直被当作王安石的对立面来讲述，形象一直是“漫画式”的，没有被真正看清楚。“所有的研究者、写作者还是希望贡献一些新的东西。对于王安石，前人的研究积累得比较丰厚了，所以我‘避重就轻’，这是我选择司马光的原因之一。”

“还原司马光所处的时代，他的思想更具代表性，可以说司马光是那个时代的中位数。司马光没有王安石那么聪明和有创造力。王安石有很多非常革命性的东西，而司马光是保守的，作为中位数，在某种程度上他更能代表时代。”赵冬梅表示，“我真正想写的，不只是司马光的传，还有司马光成长、经历、参与创造的那个时代的传记。”

司马光所处的时代，矛盾重重，改革声浪高涨。如何解决、化解矛盾，让本朝长治久安，走出“朝代更替”的怪圈，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念兹在兹、不敢稍有遗忘的大关怀。赵冬梅解读，在当时的宋朝内部，曾经存在着一种可以把这个王朝带出“朝代更替”宿命的力量，或者说，是很多因素的合力，这些因素包括：不那么强势的、尊重制度与传统的皇帝，有责任感、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官僚群体，包容异见、

接纳批评的政治风气与政治制度。1043—1044年，在仁宗大力推动下，范仲淹、富弼主导了一系列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改革，今称“庆历新政”。这被认为是最为“对症下药”的改革，它触动的是上层的利益。按照通常说法，“庆历新政”以改革派被赶出朝廷而宣告失败。赵冬梅和读者探讨：“庆历新政”的结局绝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失败”——十多年之后，改革派重返朝廷，多项改革措施重新展开，只不过姿态更低，步伐更为稳健、更加有力。司马光是“这一派”的改革者——如果我们不把“改革”跟“王安石变法”画等号，只用“改革”的原意“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部分改造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部分”，那么，司马光完全可以被称为“改革者”。他尊君、尊民，有他的改革措施、改革思路。1050年代后期的宋朝，有一种温和敦厚的、宽容的、向上的政治气候。

赵冬梅说，仁宗朝也许取得了帝制时代儒家政治所能取得的最好成绩，“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苛刻之人；刑法虽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固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宋史·仁宗本纪·赞》）——一种并不纯净整齐的中庸的美好，背后是复杂的人性更加复杂的利益缠斗。司马光和他曾经的朋友、后来的对手王安石都是仁宗朝宽容政治的产儿。只可惜，这种宽容经这两个人的手走向了终结。宽容的政治培养出不宽容的政治家，最终埋葬了宽容。晚年司马光亲眼目睹了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到他在位上辞世之际，北宋政坛已是徒留“执拗”，宽容不再。

头戴矿灯发掘遗存，厘清源流

历史学者探寻的对象，赵冬梅认为，“不仅仅是过去留下来的记载，而是人类留下的所有遗迹。”

在面对所有遗迹时，“我们所做的工作是要辨别这些历史信息流到今天的源和流，它是怎样抵达我们的。要确定信息的可靠性，不是简单的真和假，而是要辨别：这个信息出现在什么样的时间点，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最终抵达今天呈现的样子和在过程中曾经呈现的样子有什么不同等等。”赵冬梅说，历史研究是过去和现在之间无休止的对话。历史学者像一个采矿人，他戴着矿灯，照亮过去残留的信息，使得一部分的事实呈现出来，成为我们所了解的过去。“通过残留的信息尽可能地呈现当时的样子，或者尽可能接近，我们永远都是接近，事实上是永远无法真正抵达的。历史学者是人类记忆的维护者、发掘者、整理者，一个忘记过去的民族是不会有出息的。”

司马光砸缸的典故，是家喻户晓的国民记忆，赵冬梅也有探究。综合现有史料，在司马光去世后不久，蔡京当政时，在首都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司马光砸缸”就已经是人们喜爱的绘画题材了。司马光本人似乎并没有提过砸缸这件事。

司马光在15年闲居之后重返政坛，他用“黄叶在烈风中”的“危险感”来比喻自己的处境，这个比喻在司马光的笔下出现了两次。“这个比喻，让我非常有触动。”赵冬梅说，司马光此时正要回到朝中，做宰相、行大事，但他的心理状态是忧惧、朝不保夕。“好像他很蛮横、很笃定，但他内心深处感知自己如黄叶在烈风中，这是一个政治人物，即将再度投身政治时内心的不安。”

“捕捉到这样的细节，足以证明我们之前对他的认知是不准确的。”赵冬梅说，自己“是个细节控，至少在现阶段，我相信历史学相较社会科学的优势就在于细节的真实、丰富与生动，所以，我的司马光传

是充满细节的，希望不至于让读者腻烦”。

赵冬梅研究宋史逾30年，尤其在官僚制度、官僚生态、社会生活等领域有着深入研究。著有《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大宋之变：1063—1086》《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武道彷徨：中国古代的武举与武学》《千秋是非话寇准》等。赵冬梅还擅长将知识进行适当转化，对大众进行传播，她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北宋历史及相关人物，深受欢迎。在《宽容与执拗》一书中插入了司马光的肖像、《资治通鉴》残存手稿，以及与之相关人物的图像与墨迹等近40幅高清图画，让读者贴近当时的时代“面貌”，通过画面传达历史现场感，图文互证的讲述方式，能够让读者直观、具象地认识和感知历史。

赵冬梅在湖北省图书馆为读者签名留念。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晶摄)



艺术中的饮食见证文明变迁

□ 陈华文

人类的一部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饮食文化史。围绕饮食文化，从古至今被艺术家们津津乐道地描绘，不少和饮食有关的作品，成为经典之作，这不仅拓展了艺术史的叙事空间，也提升了饮食文化的思想厚度。《不散的筵席：艺术中的饮食文化史》一书，把饮食、艺术和文明的三者融合在一起，呈现出一幅饮食与艺术交融的独特“画卷”。

该书的作者吉莉安·莱利，是英国当代著名美食作家、知名食物史研究者。译者湖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年轻的向堇老师，她曾在英伦求学多年，致力于艺术理论研究和译介。饮食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仅关乎口味与生存，其背后还彰显品位与文化。该书以艺术作为入口，讲述饮食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演化及其背后的故事。

书中梳理了自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在各式各样的艺术作品中对于食物的描绘，指出艺术作品补充了大量文字史料所无法提供的信息。此外，艺术作品还能展现过去人们耕作、放牧、狩猎、收获以及交易的情景。

人类自从事艺术创造以来，视线就没有离开过饮食。上万年前原始社会，人类就在洞穴壁上作画，从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到法国拉斯科洞穴，都出现过栩栩如生的野牛画作。虽然在人类最早的画作中没有发现饮食主题的图像，但吃这件事是客观存在的。在后来的艺术作品中，饮食渐次登场，这和人类文明向前不断发展紧密相连。

古埃及时代，在不同的艺术作品中可以看出，吃不仅是为生存下去，还和信仰文化紧密相关，饮食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寓意。大约公元前1350年古埃及的一处壁画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位富有的公职人员与家禽鸟兽在一起的场景。画面中，食品柜已经装满了食物和酒水，鹅、河豚、罗非鱼等等，都是上好的食材。从古埃及的一些壁画、浮雕里能见到，那时尼罗河流域物产丰富，生菜、洋葱、大葱和大蒜生长茂盛。这些菜，据说也是修建金字塔的建造工人所食用。

古希腊—罗马时代，饮食已经成为一道壮观的文化风景。其中，古希腊时期的葡萄酒就是其中的代表。古希腊的葡萄酒，通常用陶制碗或双耳杯作为饮用器具。书中一幅插图中显示：陶碗上描绘一个美丽的女子靠在沙发上，凝视着装着葡萄酒的陶罐。古希腊很多艺术作品中，均描绘了诱人的葡萄酒。这也表明，葡萄酒在当时已经普及。古罗马时代的艺术作品中，也有大量描绘水果和蔬菜。如罗马附近的莉薇庄园一幅壁画中，生动地表现出果树、果实和飞鸟。从很多画作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罗马，普遍食用苹果、梨子、樱桃、石榴、草莓等水果。两千年过去了，这些依然都是我们仍在享用的水果。

历史阔步向前，但我们赖以生存的食物种类，更新换代的速度其实并不迅速。进入文艺复兴时期之后，大量和饮食有关的作品纷纷涌现，其背后折射出人文的情怀。油画《化身“四季”之神威灵顿的皇帝鲁道夫二世》，给人的视觉体验尤其特别。画中，果蔬和鲜花构建出神圣罗马皇帝鲁道夫二世的“画像”。画中的玉米、甜瓜、樱桃、梨子、甜瓜等等，恰如其分地描绘在人的不同部位。作为一个皇帝，为什么会认可艺术家以这样的艺术形式画自己？其实答案很简单，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食物永远是重要的存在。

食物，是生活美学的重要意象。就拿餐具来讲，中国人的一双筷子，就可以对付所有的佳肴，而西方人刀叉并用，左右手齐上阵。饮食文化在中国漫长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面貌，但遗憾的是该书并未提及。

艺术中的饮食文化，是一部值得深入探究的“大书”，具有辽阔的学术空间。《不散的筵席：艺术中的饮食文化史》带给笔者的启示：世界各地的饮食不存在好与不好，而是各有千秋。艺术创作中直接表现饮食主题，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饮食、艺术与文明互为一体，三者相互交融，离开了饮食谈艺术和文明，那么艺术和文明缺乏载体。离开了艺术和文明谈饮食，那么饮食仅仅只是为了填充肚皮，这就拉低了饮食的审美品位。

幽默让贫瘠的角落开花

□ 丁蕾

阿勒泰地处新疆北部，李娟《阿勒泰的角落》的书名用了“角落”一词，让人容易想到遗忘、想到逃避。李娟却以一个写作者的态度去认识这个被外界遗忘的贫瘠角落，以一种轻松幽默的笔触，去描述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琐事，笑对生活的困苦，让人们在阅读中感受美好与愉悦。

在《一个普通人》中，有一个流动的牧民，李娟记不住他的名，也想不起他的模样，但开店的时候，为了图个好人缘，竟然让这个牧民除了一笔不少的账。很多年过去了，这个幽默的人也在作者家成了“不要脸”的人。可有一天，这个“不要脸”的人来了，其实作者一家并没认出他来，于是拿出账本要他帮忙想想是否认识这个“不要脸”的人。稍微有点狡诈之心的世人大概会装作不认识自己的字吧？可这个普通的牧民、流动的牧民却对着账本一边吃惊地承认自己的字迹，一边揪着胡子想不起自己为什么欠账？然后分了好几次才还完那笔钱。

在李娟的叙述中，故事除了有一波三折的情节幽默，还给人一种情感逻辑的错位：除了幽默的效果，可以看到叙述情感的深厚性。这种幽默，让我看到了阿勒泰牧民生活的贫瘠，也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他们在贫困中坚守着善良和淳朴，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活的真谛。

《在门口的土路》中，作者一家悄悄地把扔在路边的空木头转轱辘带回家，用它来做家里的大圆桌、小床、小板凳等。后来，空木头转轱辘的主人，也就是那些架电线杆的人来了，就坐在他们要找的木头转轱辘做成的板凳上，讨论“那么多的木轱辘子怎么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了”，读来让人忍不住发笑。这种幽默源于作者把悄悄滚回家的东西公然坦然陈给读者，这种幽默让我们看到天真淳朴的作者一家人，也看到那些架电线杆的人的朴实、憨厚。

《我们的裁缝店》中，李娟一家为人缝制衣裳，每当和顾客讨价还价相持不下时，李娟一家就请顾客看玻璃缸里的鱼。而鱼对当地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梦一般的物，只见过画上和电视上的。等他们从曼妙的鱼中回过神来，回头再谈价钱，口气往往会微妙地软下来，简直是“化干戈为玉帛”了。作者的这种幽默源于机智灵活，用美好的事物将一场或许爆发的直接冲突巧妙化解为和谐共处。

就像那简陋之店的金鱼，能给狭隘的生活带来情趣与和谐，幽默也能给贫瘠乏味的生活带来愉悦与温暖。李娟的幽默就像水中的浪花，不时闪现，让人忍俊不禁，这源于她对沉浸式写作生活的热爱与敏锐的洞察力。

作家王安忆对李娟文字的评价为：“有些人的文字你看一百遍也记不住，有些人的文字看一遍就难以忘怀。”在贫瘠荒凉的土地上，李娟的幽默就像阳光和雨露，让生活的花朵绽放，带来心灵的安宁。



【新书】

写给一代青年的
记忆之书

□ 任文

近日，作家张炜长篇新作《去老万玉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这是张炜创作生涯中耗时最长、用功最深的一部长篇小说，灵感来自作者40年前研读地方史料过程中的发现，经由数十年的消化、酝酿，于10年前动笔，完稿后由41万字又精练至26万字，最终成就一部构思宏阔、想象华丽的长篇力作。

《去老万玉家》书写了大变局来临的19世纪末，胶东半岛之上，几股势力正暗流涌动。从广州同文馆回半岛探亲的青年舒莞屏，回程突遇风暴，借轮船延误之期完成恩师重托，前往声名远扬的万玉大营，由此开启步步惊心之旅。

作品以清末胶东沿海地域多方势力角逐的格局为原点，叙事却跳脱以往历史叙事的既定框架，而是以年轻主人公舒莞屏寻访“女大公”老万玉并身陷其军中的旅程为线索，用“一镜到底”的视角，描画出充满异彩的人性图景。

在《古船》《独药师》《艾约堡秘史》《河湾》等读者熟悉的多部小说中，倔强、坚韧的人物均有迹可循，此类彰显张炜精神世界图谱的人物，在《去老万玉家》中以主人公舒莞屏的出现而再次确立。

主人公舒莞屏象征着清末民初刚成长起来的一批青年，舒莞屏的山东之旅既是一场满怀期待的奔赴，也是一场义无反顾的逃离，一往一返中，舒莞屏最终完成了精神洗礼，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近些年，张炜尤为关注青年的成长。他曾说：“我非常关注年轻人的状态。他们当然有苦难，还有厌倦，这二者一块儿加在他们身上。我写《河湾》，主要是给年轻人的，好比给他们的一封信，地址不详，不知他们能否收到。”

新作《去老万玉家》可以视为张炜写给年轻人的另一封信。在张炜看来，这是一个初忍和藐视、周旋和看破、决绝和撞破的青春故事，一部艰难完成的世纪骄子传奇，一场迟到来的男子成人礼。

阅读《去老万玉家》，就是与青年舒莞屏一同踏上一次险象环生的旅程。此旅之后，未来将不存任何奢望和侥幸，更不再胆怯和畏惧。作者更是希望借此反思现代知识青年在时代巨变之下，个人精神道路的重新抉择。在张炜看来，这部长篇小说是他“写给一代青年的记忆之书”，也是自己“面对时代洪流的倔强心声”。